

主编 刘士林 洛秦

江南的两张面孔

刘士林 万宇 著

南开开发得晚，本来就是中国版图上政治伦理影响最小的地区，它最盛产的人文景观就是爱情和歌舞。对于南渡而来的冠人士，也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是彻底改造南方文化，还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对中国士大夫来说，不仅儒家伦理教诲使他们无法安于世俗的多半属于非道德的快乐，具有很高审美境界的道家思想，也同样不能从现实世界间烟火中获得精神上的陶醉与满足。这两种精神含量过高的资源，与把日常生活最高理想的江南文化，是很不发生沟通和会心的。

更有的时候就像创作，它最动人的部分恰是来自灵感，来自在逻辑上看来不可

性

北朝时代就是中国历史中最有灵性的一段诗性历史。南渡而来的中土衣冠之士，他们厌倦了军事斗争中真刀真枪的漂洋，对政治战线上绞尽脑汁的尔虞我诈更是深恶痛绝。一切都那么地巧，这时他们竟然一下子闯进了美丽的江南。



上海校园文化传播创新发展行动计划—中国风丛书出版项目资助



江南 的 两 张 面 孔

主编 刘士林
洛秦

刘士林
万宇
著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的两张面孔 / 刘士林, 万宇著.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3.6

(中国风: 江南文化丛书)

ISBN 978-7-80692-876-9

I. ①江… II. ①刘… ②万… III. ①文化史—研究—华东地区 IV. ①K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2484号

书 名: 江南的两张面孔

编 者: 刘士林 万 宇

责任编辑: 夏 楠 鲍 晟

封面设计: 郭大荣

出版发行: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汾阳路20号

印 刷: 上海天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110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92-876-9/J.840

定 价: 35.00元

本社图书可通过中国音乐学网站 <http://musicology.cn> 购买

主 编 人 语

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

想好好地做一点江南的书，这个愿望实在是不算短了。

每登清凉山，临紫霞湖，看梅花山的灿烂云锦，听秦淮河的市井喧闹，这种想法就会更加难以抑制……更不要说在扬州瘦西湖看船娘腰肢轻摇起满湖涟漪、在苏州的网师园听艺人朱唇轻吐“月落乌啼霜满天”，以及在杭州的断桥边遥想许多已风流云散的“三生石上旧精魂”了。这是一片特别容易招惹起闲情、逸致甚至是几分荒凉心的土地，随便一处破败不堪的庭院，也许就是旧时钟鸣鼎食的王谢之家，而山头上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小坟茔，也许深埋的就是曾惊天动地的一泓碧血……而在江南生活的所有诗性细节之中，最令人消受不起的当然要算是还乡感了。特别是在明月之夜、风雨之夕的时候，偶尔走进一个陌生的水乡小镇，它一定会勾起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生沧桑。在这种心情和景物的诱惑下，一个旅人会很容易陷入到一种美丽的幻觉中，搞不清楚此时此刻的他和刚才还在红尘中劳心苦形的那个自我，谁的存在更真实一些，谁的音容笑貌更亲切温柔一些……

然而，毕竟是青山遮不住逝水，一如江南佳丽总是难免于“一朝春残红颜老”的命运，像这样的一种诗性江南在滚滚红尘中的花果飘零，也仿佛是在前生就已签下的悲哀契约。而对于那些生逢其时的匆匆过客们，那交集的百感也不是诗人一句“欲说还休”就可以了断的。一方面是“夜深还过女墙来”的旧时明月，另一方面却是“重过阊门万事非”的江边看月之人；一方面是街头桂花叫卖声、桂花酒酿的梆子声声依旧，另一方面却是少年时代的长干、横塘和南浦却早已不可复闻；一方面是黄梅时节的细雨、青草池塘的蛙鼓依然如约而来，另一方面却是采莲、浣纱和晴耕雨读的人们早已“不知何处去”；一方面是在春秋时序中的莼菜、鲈鱼、荸荠和茨菰仍会历历在目，另一方面在夕阳之后却再也没有了夜唱蔡中郎的嗓音嘶哑的说书艺人，还有那良辰美景中的旧时院落，风雨黄昏中的客舟孤侣，浅斟低唱的小红与萧娘，春天郊原上的颜色与深秋庭院中的画烛，以及在江南大地上所有曾鲜活过的一切有声、有形、有色、有味的事物。如果它们的存在不能上升到永恒，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更值得世人保存呢？对于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万物来说，还是苏东坡的《前赤壁赋》说得好：“盖将自其变

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对于一切已经丧失物质躯壳的往昔事物，它们的存在和澄明当然只能依靠语言和声音来维系。用一种现代性的中国话语去建构一个有生命的古典人文江南，就是勉励我们策划“江南话语”并将之付诸实践的最高理念和实践力量。就像东山魁夷在大自然中写生时的情况一样，漫步在美丽的江南大地上，我们也总是会听到一种“快把我表现出来”的悲哀请求。而有时这种柔弱的请求会严厉得如同一道至高无上的命令，这正是我们必须放弃许多其他事务而首先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根源。

记得黑格尔曾说古希腊是“整个欧洲人的精神家园”，而美丽的江南无疑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灵魂的乡关。尽管正在人们注目中的这个湿润世界，已经更多地被归入历史的和怀旧的对象，但由于说话人本身是活的、正在呼吸着的生命，因而在他们的叙事中也会有一种在其他话语空间中不易见到的现代人文意义。让江南永远是她自身，让江南在话语之中穿越时光和空间，成为中华民族生活中一个永恒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江南话语》希望达到的目标和坚持不懈的人文理想。

2003年7月7日于南京白云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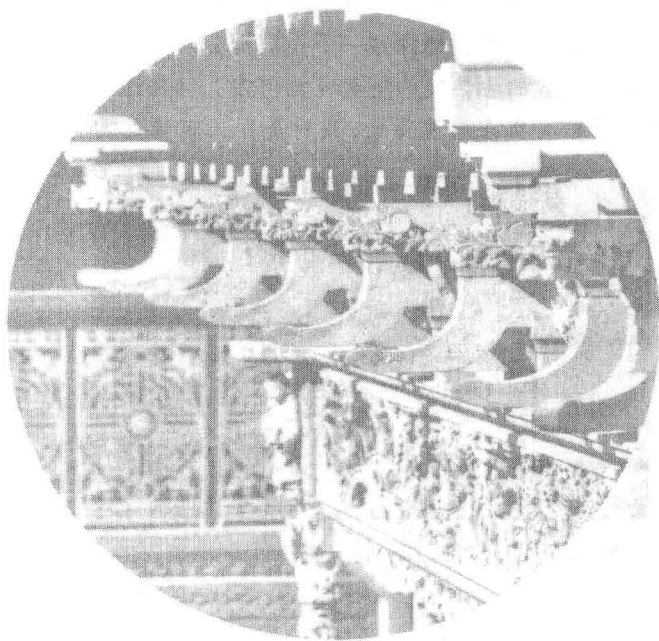
目 录

主编人语·····	(一)
小引 此身合是诗人未——不能成章的几个片断 ·····	(一)
上篇 忆江南·····	(五)
我在美丽的诗性江南——《忆江南》书后 ·····	(五三)
下篇 夜雨寄北·····	(五七)
江南大地上的异乡者——代《夜雨寄北》跋语 ·····	(一三四)
附篇 西洲在何处·····	(一三七)
(一) 杂花生树江南 ·····	(一三八)
(二) 在清凉山下 ·····	(一四一)
(三) 南京的忧伤与快乐——《斜阳旧影》读后 ·····	(一四三)
(四) 南京有什么伤感的 ·····	(一四八)
(五) 夜读杂记二则 ·····	(一五五)
(六) 八月随笔二则 ·····	(一五九)
(七) 世纪末的“古典诗话”——《夏木清阴》读后 ·····	(一六一)
(八) 床前明月光——关于唐诗精神的一些断想 ·····	(一六三)
(九) 清凉山的拾叶人 ·····	(一六八)
后记 这一次的冒险·····	(一七二)
修订后记·····	(一七五)

■ 刘士林

小 引

此身合是诗人未
——不能成章的几个片断



一 家乡无此好湖山

——《中国诗性文化》后记片断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尤其是穿行于江南如诗如画的美景，正如古人行于山阴道上，亦未尝不大得其乐。非常有趣的是，沉醉于江南山光水色中，我心头总是不由自主地轻吟起少年时非常喜欢的《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我自幼随父母漂泊于北方大地，十二岁前踏遍北方诸省，及至成人，又有雷州半岛上的数年行旅，可以说早就没有什么故乡观念了。而此次携侣归来，以美丽的诗性的江南为故乡，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好的栖居方式么？“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逐流牵荇叶，沿岸摘芦笛。为惜鸳鸯鸟，轻轻动画桡”；“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老，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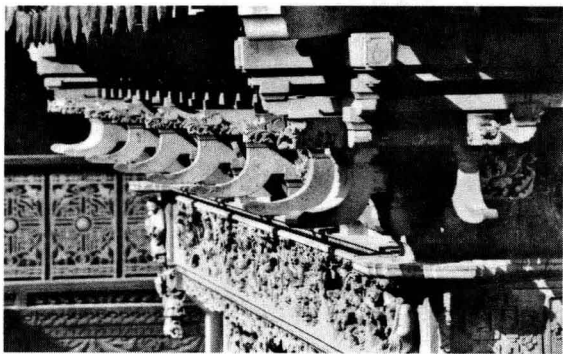
智山光好墓田”；“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呜咽江楼角一声，微阳潋潋落寒汀。不用凭阑苦回首，故乡七十五长亭。”……

当然，这样想时就难免有些伤感的颓意了。

二 忆郎郎不至

——《千年挥麈》片断

当年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授奖仪式上，发表了《我在美丽的日本》这篇著名演说，他怀着无限的伤感之情，把日本古典文化中的美叙述得至精至微。我一直也想写一篇《我在美丽的江南》，想探索一下中国那种非伦理化的古典美的精魂究竟何在。但是说来实在惭愧得紧，我对美丽江南的最初



江南民居雕刻（刘源 摄）

印象，居然来自如今已经一文不名的革命样板戏，就是《沙家浜》中那两句唱词：

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
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

就像那个饥谨的年代中所有忧心忡忡的穷人家的孩子一样，江南的好处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就是因为她是鱼米之乡，有很多好吃的和好玩的。稍大一些进了学校，在语文课本上就碰到白居易的《忆江南》，“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尽管对这里鲜艳的色彩与生动的形象根本没有任何感性体验，但是仍可以跟着那个同样在北方土生土长的男语文教师胡思乱想一番。现在看来，这两种印象最深的早期经验，实在是尚未脱离粗糙的原始的物质需要或条件反射式的再现活动，它们与真正的江南诗性内涵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江南的好东西多着呢！……我心目中江南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呢？这是我至今没有弄明白的谜，也是我无法写出《我在美丽的江南》的原因。

……我想说，我就是那古老梦幻中最年轻的郎，然而我却不知道，因欲望和尘事劳顿而不堪的我，是否已经永远失去了属于我的西洲和长干。我至今

仍没能写出一篇《我在美丽的江南》。

三 可知此地最清凉

——《谁知盘中餐》片断

从根本上讲，南北文化差异主要表现为审美主义和实用主义生活方式的对立。具体说来，北方文化的价值观主要来自墨子，它的最高理念是“先质而后文”，或者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马克思说“忧心忡忡的穷人对再美的景色也不会注意”，鲁迅先生也讲到“贾府的焦大也是不会爱上林妹妹的”。它们都可用来说明北方文化和北方人的生活观念。由于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的相对恶劣，生活本身已经足够艰辛了，特别是在灾凶之年，甚至倾尽全部生命力还不够做到“免于死亡”，因而也就不可能再有剩余时间和精力来关心非实用的东西。因而在北方人看来，人生最重要的是艰苦奋斗，至少也要在有了足够丰富的物质基础之后，才能再考虑“求美、求丽和求乐”等方面的超越问题。但另一方面，尽管墨家对物质基础的强调是十分正确的，但一旦把这个“从物质到精神”的“发展理论”绝对化，它的直接后果则必然是使人自

身成为一种“只知道吃坏马铃薯的爱兰人”……

这正如“何年何王不战争”的道理一样，什么时候才能永远没有战乱、灾凶而太平无事，或者说什么时候才能把北方式享受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够、条件置办齐呢？由于资本和条件实际上是永远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因而这种克勤克俭的生活观念和风尚一旦走向极端，那也就等于一笔勾销了有限的生命个体在尘世间享受的可能。正如《红楼梦》中《好了歌》所指出的：“终生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更何况人生的常境往往是苦乐相随，欲望和满足的关系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旦像墨家那样

把全部目光凝聚在金银财宝之上，必然会导致对内在精神需要的根本性异化，使人不再懂得珍惜日常生活中的幸福和实在，直至完全丧失掉“吃好马铃薯”这种发展的理想和需要。对于百年光阴易逝的烦恼人生来说，这当然是一种十分残酷的剥夺和异化，它残酷地剥夺了生命在艰难时世中升华生活和艺术化人生的可能。

……在某种意义上讲，南方人的生活理念类似于功利主义伦理学，充满了一种在既有条件下追求“更大的善”的精明意识，尽管它没有过于炫目的精神主张和理想色彩，但对于个体生命在日常世界中的实践和享受来说，仍然不失为一种别具一格的选择。

■ 刘士林

上篇 忆江南

忆昔午桥桥上饮，
坐中多是英豪。
长沟流月去无声。
杏花疏影里，
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
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
渔唱起三更。

——陈与义《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零

在南京清凉山有个扫叶楼，那是我经常去的一个地方，每坐于那种高而空明的茶室里小饮，我就会真心地想做一个布衲芒鞋、手执扫把的僧人，这时我会从一棵枝叶峻茂的大树飘零声中，听到许多已逝先人的亲切交谈与低语……

壹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

这短短的十个字，说的就是中国民族对城市文明那种最心碎的痛苦与失望。说“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当然不错，但还必须补充的后半句是，“城市的历史就是人们背井离乡的历史”。梦里依稀慈母泪，床前明月光中家山万里的游子之思，也远不是灯火辉煌的城市文明所能够掩盖的。昨夜入城者在经受种种现实痛苦与人生悲哀后，也就必然要带着一脸眼泪与满怀创伤出城而去。中国人喜欢旷达地说：“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但却并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让人们活得心满意足，活出味道和境界来。

行行重行行，在经历了无数不眠之夜的辗转反侧后，中国诗人终于发现他们原来痴心向往的文明中心，竟然是如此的空虚、荒淫与罪恶累累，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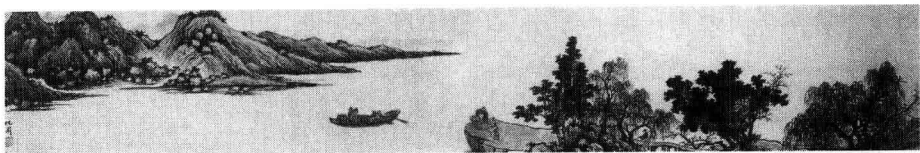


木叶丹黄图（清）龚贤

此时与简单的体力劳动、朴素的人际关系相联系的乡村生活，也就成为他们人生经纬上一个诗意归宿。但是，“君问归期未有期”，从灯火辉煌的中心退回宁静如太初的田园，当然也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它是在经历了多次反复变化与徘徊不定之后，才最后作出的无法选择的抉择。

不仅还乡之路与来路一样的曲折复杂，故乡的存在也经历了多次地理学上的变化。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在



京江送别图（明）沈周

魏晋南北朝时期，故乡是一个十分真切的桃源之梦，它充分利用了中国地理空间的广阔辽远，以及其时文明中心辐射与统治的有限性，通过回归人迹罕至的大自然和偏远乡村这种现实跋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解决所有的精神问题。而支持他们作这种选择的精神资源，也主要是处于意识形态边缘地带的道家与墨家。

“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唐宋时代士大夫的家乡则完全是一种“中得心源”的结果。由于充分意识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地理学宿命，那古老的“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桃源之梦也就彻底破灭，他们只能沉潜进与主流意识结构相对立的潜意识与无意识中，借助艺术这种白日梦或者吟咏性情这种审美吐纳，在把“惊呼热中肠”冷处理为“肝胆皆冰雪”之后，也就在小小的心理空间中找回了故乡的感觉和意境。这时帮助他们完成还乡之旅的精神资源，也就转换为以否定外物见长的佛学智慧。

“试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

乡”，尽管在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个方向的努力都已达到极限，但实际上并未安排好个体的生命归宿，这就是明清时代诗人所面临的大苦恼。这种苦恼使他们终于找到了“人生在世不称意”的更深原因。无论在自然地理上跋涉，还是在人文世界中寻觅，实际上从未在根本上解决掉精神的紧张和焦虑。由于始终把城市文明当作一个敌对者，这个强大的对手自然不可能使诗人的身心真正平静下来。

中国士大夫那脆弱的生命扁舟，在经过“断雁叫西风”的政治风暴与“小舟从此逝”的江湖之旅后，最终在夜半钟声中悄悄靠在了浅斟低唱、草长莺飞的江南杨柳岸上。

贰

“黑云压城城欲摧。”

在政治旋涡中朝不保夕的六朝士大夫，最初还是想选择一个弦歌之声不绝的城市过日子，但不久他们就彻底失望了，这些城市只有地理学意义上的不同，而它们作为文明中心的残

酷与黑暗本质则如出一辙。面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残酷现实，他们想，是到了该重新选择人生的时候了。此时，那些已经丧失政治经济军事意义，被扫入历史地理学版图因而异常宁静的旧国旧都旧乡，也就成为他们最理想的去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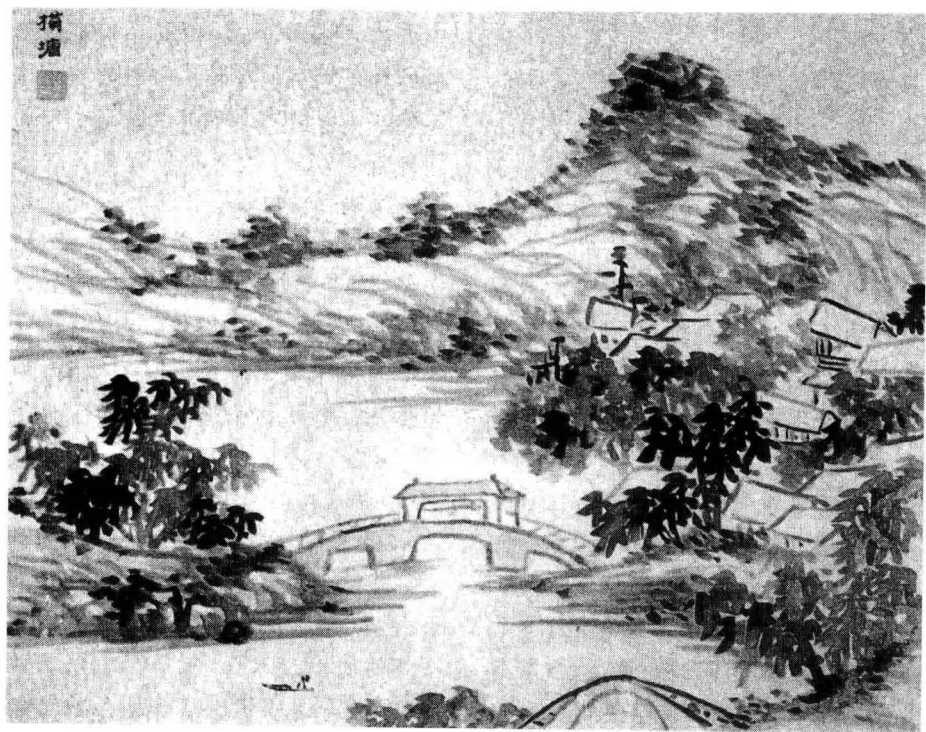
这是被他们当作精神觉醒而反复讲述的人生经验：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

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陶渊明《归园田居》）

中国士大夫颠沛流离的生命跋涉，主要是残酷与黑暗的政治斗争一手制造。《诗经》中的“黍离之悲”就是它最早的颤音，然而仅仅追问一下“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却是远远不够的。在现实世界中的政治斗争风烟俱净之后，更为严峻的人生考验才刚刚



吴中十景图（明）李流芳



雅集图（明）陈洪绶

拉开序幕。刀光剑影中的生死抉择过去了，改朝换代初期剧烈的社会与文化心理震荡趋于平静，身心憔悴的残余者的肚子也就发出咕咕叫声。出于对失去天堂的反思与眷念，他们与新兴统治者往往很难进行合作。这种不合作主义，虽然保持了“忠义”、“节操”和个体的精神自由，但同时也意味着他们被排斥在新的政治分配方案之外，这就使一直通过参政议政来获取生活资料的旧士大夫们几乎陷入了弹尽粮绝之境。

出于对文明中心剧烈震荡的厌恶，最初一大批隐士们都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庄学，他们以回归到离文明中

心最远的自然为生命的最高理想。庄子高扬人的精神情感可嘉，但却时常遗忘一个最朴素的真理：人不吃饭不行。而如何消解情感本体与食本能的矛盾，在庄学的内在理路中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解决的。庄子只讲“吸风饮露”的仙人是最高自由，但却没有指出如何能够用它们来满足凡人的辘辘饥肠。这些隐士们的逍遥实践是非常失败的，饿死在首阳山上的伯夷叔齐就是最惨痛的教训。

这是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食周粟”意味着参与“周”的政治分配序列，它的必要前提则是必须为“周”付出士大夫的体力和脑力，因而

这也就意味着不可能再保持隐士们看得比肉身更可贵的晚节。另一方面，他们也深知“人不吃饭不行”，否则就要重蹈已经成为笑谈的伯夷叔齐之故辙。既不能“不食粟”，又不能“食周粟”，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万全之策，就是吃“自己的粟”。这“自己的粟”与“周粟”的惟一区别在于，它不是从“周”的社会分配过程中得来，而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结果。这时万般无奈的隐士们才想起了墨家关于男耕女织的教诲，尽管“免去玄冠手刈禾”不够体面，甚至是十分艰辛的，但由于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普通劳动中可以做到“帝力于我何有哉”，可以与自己十分厌恶的现政权拉开最大的距离，所以一种“隐而耕”的生活方式，也就成为先秦时代持不同政见者的首选方案。

虽说如此，最初的政治隐士们实际上也是不甘心的，他们日思夜想的就是如何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不甘心的主要原因在于，和一个“鋤禾日当午”的农夫不同，他们亦稼亦穡完全是被迫的，甚至是被当作政治失败后的一种惩罚而接受的。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自幼熟悉的也不是这一行当，因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不仅不可能产生“热爱劳动”的朴素思想情感，而且还可以说他们对此是充满仇视和

悲愤的。而这一点则是他们不可能把整个身心和大地打成一片，也不可能任春雨潇潇和青禾拔节声中感到劳动的快乐和幸福的根源。

他们心头还有没有解开的思想疙瘩，这个疙瘩恰好是由于墨道两家的内在矛盾扭结的。一方面，政治隐士们所以不甘心做农民，主要是上了墨家思想的当。墨子积极倡导劳动最光荣，但却并非把它看作实践自由和获得快乐的生命方式，而是出于生存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不这样艰苦奋斗人就不能存活下去，因而劳动本身在这里也就成为一种异化劳动。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身，而恰是在剥夺和摧残他的存在，因而它的结果则必然是，一旦有可能，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四散而去。在中国历史上，以隐居来获取高官厚禄的做法之所以层出不穷，原因就在这里。另一方面，政治隐士们之所以不能重操旧业，做最能发挥他们特长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工作，则主要是由于庄学思想在心中作祟。正是因为庄子大讲特讲的独立人格和逍遥人生，使得他们不能再麻痹自己的灵魂，像动物一样“良禽择木而栖”，把自己变成一部没有情感好恶的纯粹政治机器，任人操纵任人指使任人玩耍。

最早在政治隐士身上暴露出来的



采薇图（宋）李唐

这种矛盾，也一直贯穿于中国士大夫的生命历程中。

叁

只有到了大诗人陶渊明那里，才第一次比较成功地解决了“不食粟”与“食周粟”的逻辑矛盾。

他的基本做法是，一方面，通过比较政治的忧苦和农业劳动的愉快，发掘出隐藏在生产劳动中的人生“真义”。它的主要意图是用来批判墨家的劳动哲学。劳动者生存是墨家劳动哲学的理念，它对于强调一个社会的物质基础无疑是重要的。但问题在于，墨家的根本目的在于反对儒家的礼乐教化，特别是在“非乐”的语境中，人生在世的一切快乐也都成为它批判和否定的对象，即使在他们最看重的生产劳动中，也只有劳动的沉重和劳动者的被迫无奈，这就使劳动对人自身发展的自由内涵丧失殆尽，最终沦为一种不可救药的异化劳动。而

超越眉头紧皱的墨家劳动哲学，从直接的农业劳动中开掘出自由和诗意的一脉，也就是陶渊明在回归田园之后最重要的收获。另一方面，也不再像道家那样使劲鼓吹“吸风饮露”的神仙生涯，而是使那些飘浮在大地上空的“藐姑射神人”软着陆，在五谷杂粮和桑麻话语中体验做劳动者的幸福和快乐。如果说前者是“援道入墨”，它给墨家不堪忍受的异化劳动注入了甘泉般的精神内涵；那么后者则是“以墨补道”，它给“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寂寞心灵提供了磐石般的物质基础。在解决墨道两家在先秦时代的矛盾冲突之后，陶渊明也就为中国民族的解放事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精神实践方式。

而陶渊明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则与他本人独特的精神结构密切相关。关于陶渊明的思想，前人一直看不透。朱熹说“渊明所说者庄、老”，葛立方说他是“第一达摩”，沈德潜则说他“可推圣门弟子”。儒道释几乎都